

数字经济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研究： 理论演进与展望^{*}

◎蔡庆丰 黄蕾

摘要：当前，学术界还缺乏对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理论进展的系统总结，尤其缺乏数字经济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的整合体系。为此，本文借助文献计量软件梳理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内涵，并将其理论演进过程划分为理论探索（1990—2007年）、理论融合（2008—2018年）与理论深化（2019年至今）三个阶段。为了更好地筛选出数字经济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的核心主题和内容，本文首先从政府竞争与要素禀赋及流动两个视角出发梳理了其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然后重点探讨了数字经济与传统生产要素竞争以及新型生产要素竞争之间的关系，并在综合考虑宏观和微观视角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从而建立了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的综合框架。最后，本文提出数字经济加速微观市场主体的跨区联动与协同发展可作为后续研究的重点方向，以丰富区域

协调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框架体系。

关键词：数字经济；区域协调发展；政府竞争；要素流动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区域协调发展作出了更加长远、更加系统的战略部署和总体安排。在我国区域发展进程中，均衡与非均衡、协调与不协调的矛盾始终存在，受到客观环境与经济规律的作用与制约。伴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很多经济规则和市场逻辑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地方竞争、要素流动、资源配置和区域协调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相较于传统要素，数据和技术等新型要素具有永续存在、长期反复使用的特性，不受损耗和折旧影响，具有无限供给的潜力。数据能够有效突破要素空间局限，直接参与生产。生产要素的变迁也深刻影响着地方

作者简介：蔡庆丰，厦门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副院长，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蕾，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3&ZD079）资助。

政府的要素竞争和区域协调发展。因此，如何通过数字经济发展促进要素优化配置、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落地落实、缩小区域差距的同时实现共同富裕成为重要课题。

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需要相比，理论界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稍显落后。区域协调发展研究可以回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引起理论界的充分关注，研究成果也相对分散。直到党的十九大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作为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写入了党章，区域协调发展研究才受到关注与热议。本文首先以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内涵和研究现状为起点，梳理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演进过程；其次，结合数字经济时代的背景，重点探讨当前阶段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主题与研究内容；最后，对区域协调发展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总结，并就主题拓展与研究问题等方面提出可行性建议。

一、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内涵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从平衡发展到向东倾斜的不平衡发展，再到协调发展的转变。党的十九大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七大战略之一，并将其写入了党章。这些战略尽管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提出的，但实际上属于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十三五”规划纲要将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单列一篇，包括四大板块的发展总体战略，以及特殊类型地区发展、蓝色经济空间等。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区域战略，形成了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体系，推动了东部地区经济转型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增强了区域发展的活力和协调性。具体而言，2017 年，中央决定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升为国家战略。2018 年，中央陆续将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纳入国家战略，形成了丰富多元的区域发展战略布局。近年来，随着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全面推进，东部地区经济转型升级、中部地区持续崛起、西南地区成为经济增长新

亮点、东北地区经济逐步回升。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明显，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同时，老少边穷地区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贫困地区农村贫困率显著下降，民族地区经济也获得了快速发展。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不断完善，我国正在逐步形成多层次、多领域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体系，为进一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二、理论演进：探索、融合与深化

针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情况，本文主要基于 CNKI 检索平台，以“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主题词合并检索，排除不相关的文献和重复文献后最终检索到 1990 年至 2024 年 4 月有关区域协调发展的 4930 篇 CSSCI 来源的中文文献。通过对不同期刊和学者在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主题的发表情况的分析，可以发现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的中文文献主要发表于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等专业期刊。通过关键词聚类分析可以发现，排名前五的聚类分别涉及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等单位，涵盖经济空间优化、经济地理学、科学发展观、整体协调发展以及制度型开放等方面的研究主题，这些高校的研究重点的差异反映了各自在区域协调发展领域的专业特长和学术取向。作为补充说明，本文也对 Web of Science 的检索结果进行了类似分析。经过筛选和除重后，得到 372 篇与本文研究主旨相近的英文文献。相较之下，这些检索结果与 CNKI 检索的中文文献在研究领域和数量上存在显著差异，说明依赖英文检索结果进行文献分析可能会忽视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特定情况和重要研究成果，因此，使用中文检索平台更为合适，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国内相关研究进展和学术成果。

为了更清晰地探讨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的核心问题及其发展历程，本文利用 CiteSpace 的时区网络视图对检索得到的中文文献的理论关键词进行可

视化分析,发现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演进主要经历了理论探索(1990—2007年)、理论融合(2008—2018年)与理论深化(2019年至今)三个阶段。

(一) 理论探索阶段(1990—2007年)

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关研究最早可追溯至1990年,吉林大学最早关注到区域协调发展,并于1991年9月举办了区域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研讨会,深入探讨了各省、市、县的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和实践问题,为该领域奠定了一定基础。

然而,当时只有少数学者对区域协调发展感兴趣,导致1990—1998年期间研究成果较为零散。直到1998—2007年,该研究主题才开始受到广泛关注。早期研究缺乏统一的理论指导,学者主要借助区域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问题开展探索性研究,并尝试总结适用于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在随后十几年时间里,区域协调发展逐步上升至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学者也着重从战略视角挖掘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尤其强调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环节,有助于推进西部大开发与中部崛起战略。同时,学者也将区域经济发展研究范畴从最初的生态环境研究拓宽至城市群发展规划、有为政府、政府竞争等领域,多维解析了各地区的要素禀赋与流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形成机制,以及地方政府如何识别并管理域内独特资源以提升区域发展能力。尽管大部分研究未脱离传统理论框架,但仍有部分学者进行了重要的理论创新,其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是徐现祥和李郇(2005)构建的关于地方市场分割(市场一体化)的理论框架,此框架可用于分析长三角城市群的市场分割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关系。此外,李志强等(2006)运用人工神经网络技术,提出了适宜区域协调发展预测和预警系统的构建方案。这些研究为后续研究区域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与搭建该领域的研究范式提供有益启示。

(二) 理论融合阶段(2008—2018年)

2008—2018年,区域协调发展的整体研究热度明显上升,呈现一定的理论融合趋势。孙红玲(2008)

首次从学理上探讨了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三大块”区域协调互动机制,较为全面地探讨了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的划分与形成,揭示了区域发展不平衡和主体功能区存在的共性问题。张少军和刘志彪(2009)界定了全球价值链模型的产业转移对我国产业升级的影响,为研究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视野。自此,区域协调发展开始引起理论界的高度关注,相关研究也逐渐兴起。在此阶段,学者常用的研究方法以空间计量为典型代表,研究热点由高等教育、城镇化、生态环境等领域转向新常态、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等方面,并尝试将创新理论和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引入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中,同时也广泛借鉴了新经济地理学、

空间集聚理论、组织行为学等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基础(樊杰和刘汉初,2016;盛来运等,2018)。空间经济学发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的演进,加深了理论界对区域协调发展理论构建的理解。同时,这一阶段全球生产网络理论、资源禀赋理论、本地市场效应理论在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中均得到了有效应用,为区域协调发展的拓展提供了机遇。此外,国内专业化分工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的提出较好地契合了区域市场分割研究和国内市场一体化研究,能够有效识别国内专业化分工的技术进步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差异,为解读国内专业化分工的“中心—外围”特征提供了新视角,也为加快中西部地区开发进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黎峰,2018)。

(三) 理论深化阶段(2019年至今)

2019年至今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深化阶段,区域协调发展愈发凸显出蓬勃的生机。2018年年末,中央印发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紧接着,国内期刊在2019年相继刊发了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的专题文章,学者们也开始进行更为细致的讨论和探索。与第二阶段不同的是,这一阶段更加注重研究的问题导向,除了延续探讨前两个阶段的区域发展时空差距、主体功能区、市场分割、生态环境、产业转移等,还将研究范畴拓展至“强省会”建设、黄河“几”

字弯都市圈、新型城镇化、数字经济、共同富裕、统一大市场、国内国际双循环等领域(安同良、杨晨, 2020; 陈富贵等, 2022; 陈梦根等, 2023; 江小涓、孟丽君, 2021; 李兰冰, 2020; 罗富政、罗能生, 2019; 陶长琪、徐茉, 2021; 张勋等, 2019; 周春生、扈海秀, 2020)。

同时, 学者开始尝试从更加微观的视角揭示区域协调发展的本质并试图丰富其他主流经济理论。与此同时, 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等学科的迅猛发展以及现实问题的不断涌现, 推动学术界深入探讨区域协调发展的本质, 并着眼于数字经济的背景, 展开一系列全新研究, 为区域协调发展开启了崭新篇章。在此过程中, 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理论不断更新与深化, 为政府进一步完善和实施区域发展战略提供了更丰富的思路 and 更坚实的理论支撑。

三、区域协调发展研究：核心主题与研究内容

基于前文的分析, 本文试图筛选出数字经济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的核心主题和内容。逻辑主线如下: 首先, 从政府竞争与要素配置两个维度梳理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成果; 其次, 考虑到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必然会对传统生产要素造成冲击, 本文着重分析了数字经济与区域要素竞争间的关系, 并研究数字要素如何赋能区域要素配置, 以及如何影响区域要素流动的问题; 最后, 就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归纳与深入分析。

(一) 政府竞争、要素禀赋及流动与区域协调发展

政府竞争、要素禀赋及流动与区域协调发展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彼此相互作用并相互影响着发展进程。政府竞争通常是指各地政府通过税收、财政支出、环境政策等手段吸引资本与劳动力等流动性要素进入其管辖范围, 以增强自身竞争优势的行为(Breton, 1998; 周业安等, 2004)。在这种政府竞争背景下, 新结构经济学指出, 越是符合当地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早期投资, 越能够对当地产生显著的长期影响。而地方政府会采取

政策手段加速要素在地区之间的流动, 这在改变当地要素结构的同时, 可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有利于地区间的优势互补与合作。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强了区域间的政策协调、资源共享、产业协作等方面的合作, 避免过度竞争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 同时实现地区间的互利共赢。因此, 政府竞争、要素禀赋及流动以及区域协调发展形成了一个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 共同推动着地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一方面, 政府间的政策博弈和竞争是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罗富政、罗能生, 2019)。从影响区域不协调的制度因素来看, 政府官员的晋升激励制度设计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以往单纯以GDP和财政收入为重点的政绩考评, 是导致区域激烈竞争的诱因(谢贞发、范子英, 2015), 进而导致区域经济发展极化和失衡。这种政绩考评制度使得政府官员更注重短期内的经济增长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社会发展需求, 从而造成了资源配置的失衡和区域发展的不均衡。从政府竞争的对象来看, 各类生产要素既是竞争的手段也是竞争的对象(宋马林、金培振, 2016)。尤其是存在要素流动壁垒的情形下, 各地政府通过各类政策吸引劳动力、资本并发挥土地要素的作用, 进而也会影响区域协调发展。因此, 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需要兼顾不同要素的平衡, 避免因偏重某一要素而导致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局面。

另一方面, 要素禀赋是区域发展的基础, 要素禀赋差异也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重要原因(Kerr & Kominers, 2015; 陶长琪、徐茉, 2021)。从要素禀赋自身来看, 我国区域传统要素和新兴要素禀赋存在巨大差异, 尤其是新兴要素(陶长琪、徐茉, 2021), 这也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失衡。传统要素如土地和劳动力在不同地区的分布情况和质量存在较大差异, 而新兴要素如技术、知识和人才的聚集程度和创新能力也各不相同。这种差异导致了一些地区在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发展相对滞后, 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局面。从影响要素流动配置的现实因素来看, 区域一体化受阻是其中的关键因素(李兰冰, 2020)。其具体表现为, 区域间市场、产业和空间等方面不协调, 进一步阻

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配置，限制了资源的有效利用，从而影响了区域的协调发展。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与交流，促进一体化发展，打破地区之间的壁垒，实现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二）数字经济与区域要素竞争

数字经济的崛起引发了地区要素竞争的激增，不仅涉及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等传统要素，还包括数字化基础设施、政策支持和人才吸引力等新要素。在数字经济时代，地区的竞争力取决于其在这些关键领域的优势。拥有先进数字基础设施的地区能够吸引更多的数字企业，而政府的支持政策也能助力地区竞争力提升。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地区还需注重人才吸引力和创新环境等方面，这些因素同样是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数字经济还带来了更开放的统一大市场，使得地区企业更容易拓展业务。因此，地区需要在传统和新要素竞争中脱颖而出，以在地区竞争和全球数字经济中保持竞争优势。值得注意的是，数字经济的崛起不仅加剧了地区传统要素竞争的激烈程度，同时也引发了对新型要素竞争的关注。进一步探讨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区域要素竞争，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第一，数字经济与区域传统要素竞争。现有关于数字经济发展与区域传统要素竞争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角度。从土地要素视角来看，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更为合理充分掌握农户土地产权和土地资源（张勋等，2019），并通过数字金融赋能加快农村地区的发展。还有学者聚焦于数字经济下的土地空间利用以及土地资源分配（王永进、刘玉莹，2023）。这一研究指出，数字经济发展下的办公格局和劳动力空间配置格局改变了原有的土地配置和土地利用。从劳动力要素视角来看，已有文献集中探讨数字经济对于劳动力就业（陈贵富等，2022）、劳动收入（Acemoglu & Restrepo, 2020）和异质性劳动行为（田鸽、张勋，2022）等方面的影响。首先，数字经济发展降低了劳动力不充分就业概率（陈贵富等，2022）。其次，数字经

济可能通过提升居民参与机会促进共同富裕（陈梦根、周元任，2023）。最后，数字经济时代不同群体的劳动力替代效应存在较大差异（Goos et al., 2014；Schmidpeter & Winter-Ebmer, 2021）。从资本要素视角来看，现有文献更多聚焦于数字经济发展和金融融合（黄益平、黄卓，2018），以及区域金融资源配置（Lin et al., 2013；Berg, 2020；黄益平、邱晗，2021）。就前者而言，主要认为数字金融发展和传统金融融合，赋能传统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拓展范围（邱晗等，2018；Jagtiani & Lemieux, 2018）。就后者而言，认为数字经济发展优化了区域金融资源配置及区域资本要素竞争格局（马光荣、杨恩艳，2011；聂秀华等，2018）。

第二，数字经济与区域新要素竞争。数字经济时代以数据为典型代表的新要素竞争（胡仙芝、刘海军，2022；李三希、黄卓，2022），成为当前区域竞争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谢康等（2012）研究指出，信息化和工业化的“两化”融合对经济增长公平的影响是正面与负面、当期与滞后并存的。不难发现，地区信息化和数字化竞争与区域经济增长息息相关。同时，数据要素市场建立和治理也是地区数据竞争的重点内容（金骋路、陈荣达，2022）。数字经济时代技术新要素成为区域竞争的又一重点领域（姜舸等，2021）。首先，数字技术应用有助于政府的宏观经济预测和管理（刘涛雄、徐晓飞，2015），因而数字技术应用较强的地区能够在区域竞争中获取更大优势。其次，以技术变革为先导的数字经济发展可能存在路径依赖，导致更为激烈的区域竞争。姚耀军和施丹燕（2017）指出，技术变革存在的路径依赖性区域非均衡发展逻辑结果。

第三，数字经济与统一大市场建设。从现有的研究来看，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改善资源配置和流通，促进统一大市场建设（范欣等，2017；鞠雪楠等，2020）。从软硬基础设施的角度来看，平台经济能够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统一大市场形成（余文涛、吴士炜，2020），数字经济能够提高信息沟通效率从而促进跨市场联通（范欣等，2017）。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视角来看，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降低要素流动成本（Huang & Miegheem,

2014 ; Rodrigue, 2020)、提升竞争效率(余文涛、吴士炜, 2020)。

(三) 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密不可分, 数字技术的不断演进不仅为区域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也为区域间的合作与协调提供了新的契机。在数字化时代, 地区经济的竞争力与数字化程度息息相关, 而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则需要借助数字技术的力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协同发展。因此, 深入探讨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 对于促进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就地区层面而言, 数字经济与都市圈、城市群和城镇化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关于数字经济对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的影响,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 主要的观点认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形成推进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宋则等, 2010 ; Eckert & Hüsigg, 2022)。一方面, 数字经济下的数字基础设施联通提升城市和区域辐射能力, 助力都市圈和城市群一体化实现(邓慧慧等, 2022)。另一方面, 数字经济发展下的知识溢出也是推进一体化的重要基础(张勋、乔坤元, 2016)。关于数字经济与城镇化,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 数字经济发展和要素融合形成了城镇化发展的分工基础(Abel-Koch, 2013)和要素基础(安同良、杨晨, 2020 ; 江小涓、孟丽君, 2021)。就前者而言, 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突破区域原有界限式的分工模式(Zhu & Chen, 2022)。就后者而言, 数字经济发展与各类要素融合可能会影响城镇化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激发社会创业创新氛围、增加就业机会(Nambisan et al., 2018), 还能通过基础设施联动缩小区域差异(Glaeser & Gyourko, 2018)。就企业层面而言, 数字经济发展与区域协调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从现有的相关研究来看,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跨区域行为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 主要集中在供应链分工协同(袁淳等, 2021 ; 李青原等, 2023)和企业搬迁(安同良、杨晨, 2020)两个角度。从分工协同的视角来看, 数字赋能专业化分工、优化创新资源配置(Charles & Tonett, 2020 ; 袁淳等, 2021), 从而促进地区协同。还有文献则聚焦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跨区域搬迁的

影响。安同良和杨晨(2020)研究指出, 网络经济时代, 互联网已成为地区竞争优势的源泉, 对企业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能够吸引外地企业进入。

综上所述, 现有关于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相对零散, 且更多集中于探讨数字经济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未能在研究中有效凸显“协调”的重点内涵, 且研究的系统性还有所欠缺。具体表现为: 第一, 现有关于数字经济对区域要素竞争的研究更多聚焦于对劳动力和资本传统要素竞争的研究, 而相对较少关注数据这一新型要素竞争的影响以及数据要素赋能其他生产要素的影响, 因而难以有效揭示要素竞争下的区域协调发展路径。第二, 现有研究相对局限, 目前仅停留在数字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布局、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分工等方面, 尚未充分探究数字经济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以及重大生产力布局的影响。第三, 现有研究更多关注数字经济对供应链、产业链上企业分工合作以及企业搬迁的影响, 未能够从企业行为视角深度探究数字经济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微观影响, 因而未能从微观层面清晰揭示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及背后机理。

四、研究展望

在前文基础上, 本文提出数字经济加速微观市场主体的跨区联动与协同发展可作为后续研究的重点方向, 以丰富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框架体系。具体而言, 在要素自由流动的前提下, 要素会从生产效率较低的地区向生产效率较高的地区转移, 一方面提升了流出地的经济效率, 另一方面, 资源要素也能够生产效率较高的地区获得更高的回报率。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商品和要素在空间上的流动更加自由, 市场范围不断扩大, 有利于提高企业收益、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 也有助于区域之间深化产业分工、扩大生产专业化, 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帮助微观企业更便捷地获取全球范围内的商机和资源, 实现跨地区的业务合作和交流。而远程办公、在线会议的兴起降

低了微观企业跨地区互动的成本，提高了跨区域协作的效率。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海量的数据能够帮助地方政府更好地了解辖区内的经济发展情况，便捷的移动通信网络能够提升政府与企业，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沟通协作效率，使得地方政府能够更精准高效地统筹区域经济发展，实现高质量的区域协调发展。此外，随着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模式新业态的兴起、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各地数字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不断推进，数字经济也对微观劳动力的流动决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数字经济发展能否帮助微观企业实现跨区域发展？地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政府建设能否助力区域协调发展？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微观劳动力流动决策，能否实现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与高效集聚？本文认为， these 问题是未来研究可以重点关注的研究方向，有助于补充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同时拓展数字经济时代区域协调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学理边界，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参考文献：

[1] 安同良、杨晨. 互联网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格局：微观机制与宏观效应 [J]. 经济研究, 2020, 55 (2) : 4-19

[2] 陈贵富、韩静、韩恺明.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劳动力不充分就业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 (8) : 118-136

[3] 陈梦根、周元任. 数字经济、分享发展与共同富裕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3, 40 (10) : 5-26

[4] 邓慧慧、刘宇佳、王强. 中国数字技术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研究——兼论网络型城市群建设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 (9) : 121-139

[5] 樊杰、刘汉初. “十三五”时期科技创新驱动对我国区域发展格局变化的影响与适应 [J]. 经济地理, 2016, 36 (1) : 1-9

[6] 范欣、宋冬林、赵新宇. 基础设施建设打破了国内市场分割吗? [J]. 经济研究, 2017, 52 (2) : 20-34

[7] 胡仙芝、刘海军. 包容审慎监管：论新基建监管框架构建的过渡性和开放性 [J]. 管理世界, 2022, 38 (2) : 116-128+168+8

[8] 黄益平、黄卓. 中国的数字金融发展：现在与未来 [J]. 经济学 (季刊), 2018, 17 (4) : 1489-1502

[9] 黄益平、邱晗. 大科技信贷：一个新的信用风险管理框架 [J]. 管理世界, 2021, 37 (2) : 12-21+50+2+16

[10] 江小涓、孟丽君. 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J]. 管理世界, 2021, 37 (1) : 1-19

[11] 姜柯、安同良、陈孝强. 新发展格局下的互联网与数字经济研究——第二届互联网与数字经济论坛综述 [J]. 经济研究, 2021, 56 (4) : 198-200

[12] 金骋路、陈荣达. 数据要素价值化及其衍生的金融属性：形成逻辑与未来挑战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2, 39 (7) : 69-89

[13] 鞠雪楠、赵宣凯、孙宝文. 跨境电商平台克服了哪些贸易成本？——来自“敦煌网”数据的经验证据 [J]. 经济研究, 2020, 55 (2) : 181-196

[14] 黎峰. 国内专业化分工是否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8, 35 (12) : 81-99

[15] 李兰冰. 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逻辑框架与理论解释 [J]. 经济学动态, 2020, (1) : 69-82

[16] 李青原、李昱、章尹赛楠、郑昊天.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信息溢出效应——基于供应链视角的经验证据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3, (7) : 142-159

[17] 李三希、黄卓. 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机制与证据 [J]. 经济学 (季刊), 2022, 22 (5) : 1699-1716

[18] 李志强、詹锋、周丽琴. 基于 BP 网络算法的区域协调发展预测与预警研究 [J]. 统计研究, 2006, (4) : 24-26

[19] 刘涛雄、徐晓飞. 互联网搜索行为能帮助我们预测宏观经济吗? [J]. 经济研究, 2015, 50 (12) : 68-83

[20] 罗富政、罗能生. 政府竞争、市场集聚与区域协调发展 [J]. 中国软科学, 2019, (9) : 93-107

[21] 马光荣、杨恩艳. 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创业 [J]. 经济研究, 2011, 46 (3) : 83-94

[22] 聂秀华、江萍、郑晓佳、吴青. 数字金融与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研究 [J]. 金融研究, 2021, (3) : 132-150

[23] 邱晗、黄益平、纪洋. 金融科技对传统银行行为的影响——基于互联网理财的视角 [J]. 金融研究, 2018, (11) : 17-29

[24] 盛来运、郑鑫、周平、李拓. 我国经济发展南北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J]. 管理世界, 2018, 34 (9) : 16-24

[25] 宋马林、金培振. 地方保护、资源错配与环境福利绩效 [J]. 经济研究, 2016, 51 (12) : 47-61

[26] 朱则刚、常东亮、丁宁. 流通业影响力与制造业结构调整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0, (8) : 5-14

[27] 孙红玲. “3+4”：三大块区域协调互动机制与四类主体功能区的形成 [J]. 中国工业经济, 2008, (10) : 12-22

[28] 陶长琪、徐莱. 经济高质量发展视阈下中国创新要素配置水平的测度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1, 38 (3) : 3-22

[29] 田鸽、张勋. 数字经济、非农就业与社会分工 [J]. 管

理世界, 2022, 38 (5): 72-84

[30] 王永进、刘玉莹. 在线劳动力市场、异地办公与中国区域布局[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3, 40 (8): 25-45

[31] 谢康、肖静华、周先波、乌家培. 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质量: 理论与实证[J]. 经济研究, 2012, 47 (1): 4-16+30

[32] 谢贞发、范子英. 中国式分税制、中央税收征管权集中与税收竞争[J]. 经济研究, 2015, 50 (4): 92-106

[33] 徐现祥、李郁. 市场一体化与区域协调发展[J]. 经济研究, 2005, (12): 57-67

[34] 姚耀军、施丹燕. 互联网金融区域差异化发展的逻辑与检验——路径依赖与政府干预视角[J]. 金融研究, 2017, (5): 127-142

[35] 余文涛、吴士炜. 互联网平台经济与正在缓解的市场扭曲[J]. 财贸经济, 2020, 41 (5): 146-160

[36] 袁淳、肖土盛、耿春晓、盛誉.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分工: 专业化还是纵向一体化[J]. 中国工业经济, 2021, (9): 137-155

[37] 张少军、刘志彪. 全球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动力、影响与对中国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启示[J]. 中国工业经济, 2009, (11): 5-15

[38] 张勋、乔坤元. 中国区域间经济互动的来源: 知识溢出还是技术扩散?[J]. 经济学(季刊), 2016, 15 (4): 1629-1652

[39] 张勋、万广华、张佳佳、何宗樾. 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J]. 经济研究, 2019, 54 (8): 71-86

[40] 周春生、扈秀海. 无限供给: 数字时代的新经济[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0

[41] 周业安、冯兴元、赵坚毅. 地方政府竞争与市场秩序的重构[J]. 中国社会科学, 2004, (1): 56-65+206

[42] Abel-Koch, J. Who Uses Intermediari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Evidence from Firm-level Survey Data[J]. The World Economy, 2013, 36(8): 1041-1064

[43] Acemoglu, D., Restrepo, P. Robots and Jobs: Evidence from US Labor Market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20, 128(6):2188-2244

[44] Berg, T. On The Rise of Fintechs: Credit Scoring Using Digital Footprints[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20, 33(7):2845-2897

[45] Breton, A. Competitive Governments: An Economic Theory of Politics and Public Fin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46] Charles, J., Tonetti, C. Nonrivalry and the Economics of Dat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0, 110(9): 2819-2858

[47] Eckert, T., Hüsig, S. Innovation Portfolio Management: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in Regards to Digital Service Innovations[J]. Management Review Quarterly, 2022, 71:187-

230

[48] Glaeser, E., Gyourko, J.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 of Housing Supply[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8, 32(1):3-30

[49] Goos, M., Manning, A., Salomons, A. Explaining Job Polarization: Routine-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Offshoring[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8): 2509-2526

[50] Huang, T., Miegheem, J. A. Clickstream Data and Inventory Management: Model and Empirical Analysis[J].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2014, 23(3):333-347

[51] Jagtiani, J., Lemieux, C. Do Fintech Lenders Penetrate Areas That Are Underserved by Traditional Banks?[J].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2018, 100:43-54

[52] Kerr, W., Kominers, S. Agglomerative Forces and Cluster Shapes[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5, 97(4):877-899

[53] Lin, M., Prabhala, N. R., Viswanathan, S. Judging Borrowers by the Company They Keep: Friendship Networks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y in Online Peer-To-Peer Lending[J]. Management Science, 2013, 59(1):17-35

[54] Nambisan, S., Siegel, D., Kenney, M. On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s, and Entrepreneurship[J].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2018, 12(3):354-368

[55] Rodrigue, J. P. The Distribution Network of Amazon and Footprint of Freight Digitalization[J].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2020, 88:10825

[56] Schmidpeter, B., Winter-Ebmer, R. Automation, Unemployment, and the Role of Labor Market Training[J]. European Economics Review, 2021, 137:103808

[57] Zhu, W., Chen, J. The Spatial Analysis of Digital Economy and Urban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in Hangzhou, China[J]. Cities, 2022, 123:103563

(责任编辑: 辛本胜)